

“野草”精神与散文诗的时代薪火

□周庆荣

●散文诗的根性属性，必须是诗的。散文是它的形，诗歌是它的魂。句式的舒展、结构的自由、叙事的随性，是散文诗外在的形态特征。凝练的诗性、含蓄的诗思、悠远的诗意、留白的诗境，是散文诗安身立命的根本

●新时代的散文诗写作，不应局限于一己情怀、一方风月。写作者要赓续五四时期延续至今的《野草》的精神血脉，以“格物、及物、化物”的在场写作，为散文诗注入深刻的思想性、鲜活的时代性与深沉的人文性

从大三时开始散文诗写作至今，倏忽40余年。在沉静之年回望来路，如果进行精神溯源，就不能不提及最初给予我文学启蒙的几道光源：其一，是鲁迅的文本与精神风骨；其二，是域外经典散文诗开阔、自由、富于思辨的文体范式；其三，是因为对东西方哲学的迷恋而培养起来的思考习惯。那时，虽无刻意于成名的写作执念，但通过反复品读鲁迅，读懂其文字肌理中根植土地的悲悯、直面困顿的倔强与超越个人悲欢的担当，再品味域外散文诗那种整体转喻而内置诗意的表达策略，自己也产生了写作散文诗的冲动。

散文诗的诗性根基：一切因为诗，一切为了诗

将散文诗与分行诗相较，前者叙述上的延展性自由而灵动，绝非降低诗意标准的描摹状景和抒情的漫漶。它让写作者卸下格律和跳跃留白的枷锁，以最贴合内心与现实的笔触，记录世间万象、体察人世浮沉。同时，散文诗的笔墨不能局限于个人风月、细碎情绪，而要让段落式的叙述变成规模化的意象，使“散文”的价值落在“一切因为诗，一切为了诗”。

此前，我去绍兴出差，从咸亨酒店满溢的市井烟火中缓步前行。数百步之隔，喧嚣便悄然褪去，鲁迅故居的静谧安然扑面而来。我特意独坐百草园，不观游人络绎，只静对一方庭院的草木泥土、旧瓦天光。初夏的风掠过荒径杂草，枝叶轻摇，光影错落，眼前寻常草木，恰是读懂《野草》最好的注解。年少读《野草》，多见文字的冷峻、意境的孤寂；中年再读，方懂鲁迅先生落笔的万般深沉。

野草生于阡陌荒土，无人浇灌，无人瞩目，遭践踏而不绝，历枯寒又重生。它是世间最平凡的生命，却拥有最坚韧的生命力。鲁迅写野草，不是描摹一物一景，而是以微观物象寄宏大情志。那一丛从卑微却挺立的草木，是乱世之中隐忍求生的苍生，是因顿时代不肯屈服的人格，更是一个民族在风雨飘摇中的精神脊梁。

鲁迅以戏剧、以梦呓、以独语甚至以隐晦的呐喊，呈现出他对当时社会与人的忧虑和关切，《野草》留给后世写作者最珍贵的启示，是打通了个人与时代、小我与苍生之间的文学通道。真正

的写作，不是书斋里的孤芳自赏和脱离大地的凌空抒情，写作者所有的细微观察、生命感悟、精神思索，最终都必须扎根土地、联结民众、共情家国。个人的情绪虽然也是真实的，但众生的悲欢、时代的进退、民族的沉浮，才是文学最厚重、最恒久的书写母题。这份“以小我观大世、以物象载精神”的野草内核，是40多年来我心中真正的散文诗的火苗。

散文诗的时代薪火：格物、及物、化物

说起散文诗的时代薪火，它应该是“野草”精神的继续。散文诗的写作者，需要对这片土地的懂得与热爱，需要记录当下的人们在大地上劳作的努力和行走的足迹，需要对未来进行希望和人之为人的预言。几年前，我曾提出“格物、及物、化物”的散文诗在场性写作理念，初衷只是对自身写作的规整与警醒。后来我慢慢地发现，这样的“及物”写作，既是强调每个人必须拥抱生活，也是有效凸显散文诗“意义化写作”的突围路径。

所谓格物，是写作的根基。写作者俯身向物、真诚观世，摒弃主观臆想，悬浮空谈与套路化审美。不追逐浮华表象，不盲从流行文风，耐心体察万物的本真形态、生长规律与精神特质，于寻常草木、人间烟火、岁月山河中，看见细节、读懂温度、窥见本质。散文诗之言之有物，首先便在于格物，唯有读懂万物，笔墨才有依托，文字才有根基。

所谓及物，是写作的在场。拒绝书斋式的自我封闭写作，让笔墨走出小我情绪的圈层，主动

触碰现实、拥抱时代、贴近苍生。散文诗的自由形态，赋予了它最灵活的在场表达能力。它可以记录山河变迁、描摹人间百态，也可以审视时代变局、书写精神成长。及物，便是让文学不脱离现实土壤，让每一段文字都扎根真实的生活体验、真实的时代脉搏、真实的众生境遇，彻底告别空洞抒情与虚无写作。

所谓化物，是写作的境界，也是散文诗从写景叙事抵达思想深度的关键一步。写作者将自我情志、生命体悟、时代思考全然融入物象，实现人与物、情与理、小我与大世的浑然统一。不直白说教、不刻意拔高、不直抒胸臆，让哲思藏于实景，让情志隐于物象，于松弛舒展的叙述中，自然流露文字的厚度与格局，实现含蓄深沉、余味悠长的文学留白。

散文诗不应局限于一己情怀、一方风月

长久以来，当代散文诗创作存在普遍的审美桎梏。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反思、试图突破的文体困境。曾经的散文诗写作，过度偏爱浅表的审美表达，沉溺于文字的精致、意境的灵动、抒情的温热。太多作品辞藻优美、笔触轻盈，读来赏心悦目，却轻若无物，它们只有文学的皮囊、细碎的情绪，却没有思想的筋骨和时代的重量。

灵动变成了单薄，优美沦为为了浮华，泛滥的“热抒情”消解了散文诗的思辨力量，套路化的风月书写局限了文体的精神格局。许多创作者固守“散文诗即唯美小品”的认知，止步于浅层审美，不愿扎根现实、深耕思想，久而久之，让这一极具潜力的文体，渐渐沦为小众的消遣文字，失去了

直面时代、启迪人心、承载精神的核心价值。

而今，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：山河迭代、社会革新，文明传承、精神重塑，时代波澜壮阔，人间万象纷繁。日新月异的生活、跌宕起伏的时代、蓬勃向上的民族、丰盈多元的众生心境，都迫切需要与之匹配的文学书写。大时代绝缺少轻盈的审美，但更需要厚重的记录、深沉的反思、坚定的精神表达。

散文诗无需抛弃自身的天赋优势。自由舒展的句式、灵活包容的叙事、细腻温润的表达，是这一文体独有的特质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舍弃美与灵动，而是超越单一的浅表审美，完成文体的升维成长。依托散文诗松弛、自由、兼容度极高的叙述优势，跳出风月抒情的惯性，以“格物、及物、化物”的在场写作，为文体注入深刻的思想性、鲜活的时代性与深沉的人文性。

我们应该以物象观照时代，以细微洞察宏大，以从容的散行叙述，承载变局之下的社会思考、人文悲悯与民族情志。让散文诗这一文体不再是轻浅的审美小品，而成为能够扎根时代、记录时代、诠释时代的独立文体，让柔软的文字，承载起坚硬的时代命题与恒久的精神力量。

无论如何革新表达、突破边界、拥抱时代，我始终坚守散文诗不可动摇的本体准则：散文诗的根性属性，必须是诗的。散文是它的形，诗歌是它的魂。句式的舒展、结构的自由、叙事的随性，是散文诗外在的形态特征。凝练的诗性、含蓄的诗思、悠远的诗意、留白的诗境，是散文诗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若失却诗的根性，一味追求叙事、议论与写实，文字便只会沦为松散的随笔、直白的议论、平淡的纪实，唯有散文诗的外壳，没有独特的文体内核与气质。



所谓诗性根基，是语言的凝练克制、表达的含蓄留白与立意的深远通透，更是一种诗性的生命观与世界观。这需要写作者能从寻常万物中看见诗意，能在平凡生活中读懂精神，能于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的文学格局。

散文诗的写作，需要一种在寻常事物里看见诗意的“格物”的耐心，也需要让文字真正触摸时代肌理的“及物”的诚恳，更需要“化物”的哲思。我们不只要记录生活，更要消化生活。让思想隐于形象，让议论含于情感，才能在时代的底色上，写出既接地气又经得起咀嚼的文字。

半生与散文诗相伴，我始终坚信，鲁迅留给中国文学的“野草”精神，便是当代散文诗最珍贵的时代薪火。野草之精神，是平凡中的不屈，是荒芜中的生长，是静默中的坚守，也是那股生生不息的劲儿。它不张扬、不喧嚣，植根于现实的贫瘠，却始终向阳逐光。这恰如优秀的散文诗写作：不刻意造势，不追逐流量，不盲从浮华。它始终扎根大地、贴近人民、沉心思辨，在从容的书写中积蓄力量、传递温度。

新时代的散文诗写作，不应局限于一己情怀、一方风月。写作者要赓续五四时期延续至今的《野草》的精神血脉，坚守诗性本体，坚持在场写作，突破浅表抒情的桎梏和唯美狭小的格局，让散文诗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，在百年变局的新时代里，挣脱偏见、褪去轻浮、沉淀筋骨，肩负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使命与时代担当。

野草年年枯荣，文脉代代相传。守住诗之根本，秉持野草初心，深耕现实土壤，当代散文诗的時代薪火，必将生生不息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、《星星·散文诗》名誉主编）

创作随笔

文学创作中的『草木皆兵』

赵德发

来到安徽寿县，就走进了苍茫的历史。古城巍巍，淮河汤汤，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从未飘散，每一处山水都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

我入住酒店后凭窗眺望，只见马路对面是刚收割的麦田，淡黄色的麦茬地铺展得很远，一直延伸到一座青山脚下。那是什么山？我打开手机上的百度地图，“八公山”三个字让我心头一震——这不就是传说中淮南王刘安和这位老人修炼成仙的地方吗？这不就是让前秦天王苻坚疑神疑鬼、以为“草木皆兵”的那座山吗？

继续查看地图，发现在我的居所和八公山之间横亘着淝河。原来，我已经身处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了。遥想当年，苻坚统帅八十多万军队何等自信，曾扬言将马鞭投入长江会让江水断流。然而，他来这里吃了一场败仗，就对晋军心生畏惧了。他站在寿阳城北北望，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入形。自信心崩塌加上指挥失误，一败涂地便成了必然。

第二天，我参加的活动在孔庙举行。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庙宇，可谓“斯文在兹”。两棵千年银杏树高大葱茏，在大成殿前洒下一片阴凉。交流对话的主题围绕“大文学观与文学‘县’场”和“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地域性写作”展开。在我发言时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，“在文学创作中，作家如何有效处理地域性经验？”我觉得可以使用三条方法：一是发现意义，二是嵌入历史，三是充分想象。谈及想象，我说，当年淝水之战中的苻坚在惊恐中出现幻觉，将八公山的草木看成了兵士。在文学创作中，有时也需要将A事物看作B事物，但此时作家的心理并非惊恐，而是想象力在起作用。小说家要具备多种才能，想象力居首位。想象力越出色，小说可能越优秀。许多杰出作家思路清奇，都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。我读刘亮程的长篇小说《长命》，感觉他就像一位“巫师”，挥动想象力的“魔杖”，打通生死、时间、万物、声音、血脉五重边界，构建了一套独属于戈壁乡村的超现实主义体系。他想到的、写到的，匪夷所思，令人惊叹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参观了寿县的一些文化设施。到了县文化艺术馆，馆长请作家们“留下墨宝”。刘亮程用独具风格的行书写了一副对联：“草木皆兵非植物，风声鹤唳皆文章”。这肯定是他自撰的，既延续了上午对话中“草木皆兵”的话题，也阐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中的一条成功秘诀。欣赏着这幅字，我的思绪再次围绕“想象”一词展开。我意识到，我们平时谈到想象，前面往往会加上“合理”二字，然而在文学创作中，却要大胆使用“不合理想象”，敢于超越常识，超越逻辑。譬如韩国作家韩江的小说《素食者》，其中体现出的想象力超凡绝伦：一个叫英惠的普通女子，为了逃避来自丈夫、家庭、人群和社会的暴力，突然拒绝吃肉，拒绝为家人准备饭菜。后来，她甚至拒绝自己的“人类”身份，把自己当成了一株植物，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、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树。

走进寿县的第三天，我们游览八公山。到了山顶，我遥望寿县古城，恍惚间将其看成了一方棋盘，纹样列星，绵密厚实。心想，这一盘千年大棋，对弈者是谁？有过多少次输赢？

我慨然良久，而后到树林边静静站立。我想象自己，此刻已变成草木，不知寿县城头的游人，会将我看作什么？

（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、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）

《收获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天涯》《作家》：

“神话”的回响与个体写作的时代景深

□车信显

情感和关系，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。所以个体的神话性，最终会“嵌入时代之中”。

学者陈思和曾从当代长篇小说中提炼出普遍存在的“历史—家族”叙事模式：“在莫言与张炜的创作里，这种叙事又融入了神话的因素。张炜的《刺猬歌》同样属于‘历史—家族’的大框架，但在后者那里，历史被淡化，而神话被凸显出来，小说大量融入胶东民间的野物传说、精灵故事，历史时间退到背景，神话寓言成为叙事主体。”在与我们更贴近的当下，时代大势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个体提供更完备也更个性化的发展空间，历史裹挟着家族的叙事已经逐渐淡化成背景，但时代神话并没有消失，而只是换了形态。如若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历史和家族的层面，那么这种神话寓言便不再单单属于个体，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“神话”。范廷的长篇小说《乌衣巷》（《收获》2026年第3期）便是向古人或他乡远远借来一个模糊的“神话”，以映衬今日的社会。“乌衣巷”象征着从王谢世家到寻常百姓的视角转换，也正是小说的应有之义。《乌衣巷》写了一个不在中国本土的“唐人街”的故事，围绕阿婵和阿雀两个女性角色的生命经验展开。这与此前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有些相似：在异域的生活故事本身就有着神话色彩，两个故事都借沉淀下来的历史中厚重的神话性，彰显血泪下的美好。但《乌衣巷》不同于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其中的人物缺少温情的互助，两位贯穿全篇的女性之间也并未产生真正的生命纠葛。或许正因每个人物都走向了悲剧性的一面，作者在小说中插入对话文体，借刘禹锡之口来警示自己的写作或许有陷入“俗”的风险。但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份不可脱的“俗”，才避免了文学作品因追求完美圆满而如伊卡洛斯般因飞高而坠落，才展示出一幅“俗世神话”，真切地映照出时代中的众生相。

神话同样也寄寓于新诗与非虚构作品中。非虚构与新诗常被看作两种差别极大的文类，但遍览几种刊物，我们会发现其中刊载的诗歌多有叙事性甚至非虚构的底色：张晓雪的组诗《爱意深重》（《上海文学》2026年5月刊）对身边人爱恋的书写、曹小航的组诗《杯底的倒影》（《上海文学》2026年4月刊）对个体生活的直

呈……这些作品都具有一种朴素的生活品格，拒斥着模糊不清的自我形象，并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印证个体。在《电铃声里的时光流转》（《天涯》2026年第3期）一文中，黄灯同样以自己的“成长史”为支柱，回顾个人写作历程，发觉只有在个体的抉择与感受的路途中才能“看见”他人与世界，看清个体与时代的关联。这是一种朴素的、从真实生活里生长出来的超越性，通过个体的真实感受和抉择，抵达他人和时代。

个体与时代的“神话”如何相互联结？除却“俗世神话”外，文学线索如何才能展示出另一种时代大势？韩少功在去年的一次讲演中，曾把20世纪的文学勾勒为“自我性”与“人民性”两条路径，并认为人文主义在当下仍然未曾泯灭：“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，用一种大口径历史的角度，来重新描述文学史，比方用‘人民性’和‘自我性’这两个路线，大体梳理20世纪的文学遗产，以照顾认知目标、社会背景、资源依托、美学趋向等诸多方面……新世纪的碎片化甚至粉生化，仍在受到humanism的顽强抵抗……‘文学是人学’这句话，我们不妨继续说下去。”我们理应看到，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发展，人民合力塑造时代大势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，这种变化使得文学难以面面俱到地承载个体与时代的关联。但这或许也有利于文字成为更凝练、集中的艺术载体，在简练与抽象中焕发出深意，让个体的心魄容纳起时代神话最本真的模样。这大抵正是个体与时代神话的另一个交汇点。

或许，在这些最质朴、扎实的写作中，“神话”获得了最纯粹的意义：它可以不栖身于文学线索，而是融入个体，使有时代意识的个体能够成为“自我性”和“人民性”之间的枢纽，从一种文学修辞，转变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。
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）